

## 《詩經》諷諭精神之傳承—

## 朝鮮詩人丁若鏞「三吏」對杜甫「三吏」的接受與轉化

蔡慧崑\*

## 摘要

朝鮮實學派詩人丁若鏞嫻習《詩經》，酷愛杜詩，尊崇杜甫，曾寫下許多仿杜或次韻杜詩的作品。丁若鏞的「三吏」(〈龍山吏〉、〈波池吏〉、〈海南吏〉)，便是仿效杜甫的「三吏」(〈石壕吏〉、〈新安吏〉、〈潼關吏〉)而作，可謂《詩經》諷諭精神之傳承。

從詩作的體制與主題思想，可以看出丁若鏞「三吏」對杜甫「三吏」的接受：體制方面，丁若鏞「三吏」和杜甫「三吏」都是以敘事為主體的五言古詩，而且〈龍山吏〉對應〈石壕吏〉、〈波池吏〉對應〈新安吏〉、〈海南吏〉對應〈潼關吏〉，丁詩近乎全面地次韻杜詩、借用杜詩的韻腳，語詞也不乏化用杜詩之處。主題思想方面，丁若鏞「三吏」寫照李朝大荒之年，杜甫「三吏」記敘唐代安史之亂，兩者寫作的年代、背景固然不同，卻都深刻地描寫社會現實，反映民生疾苦，實踐《詩經》傷時憤俗、美刺勸懲、以風刺上的諷諭精神，試圖匡正君心，流露憂國憂民、悲天憫人的情感基調。

不同於杜甫「三吏」多採用第一人稱視角、詩人自己介入敘事之中抒發所見所聞的主觀感受和見解；丁若鏞「三吏」多採用第三人稱視角，以旁觀者的立場理性、客觀地敘事、寫人或議論，可以視為對杜甫「三吏」的轉化。

**關鍵詞：**丁若鏞、杜甫、三吏、詩經、接受

**An Exchange of the Ironic Spirit of "The Book of Songs" :**

**Korean Poet Ding Ruoyong's "Sanli" on the Recep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Du Fu's "Sanli"**

**Abstract**

Ding Ruoyong, a Korean poet of practical learning, studied "The Book of Songs", loved Du Fu's poems and treated Du Fu with respect. He had written many poems by imitations of Du Fu's poems. Ding Ruoyong's "Sanli" just

---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imitated Du Fu's "Sanli". It was an exchange of the ironic spirit of "*The Book of Songs*"

From the system and theme of poetry, we can see that Ding Ruoyong's "Sanli" on the reception of Du Fu's "Sanli": In terms of system, Ding Ruoyong's "Sanli" and Du Fu's "Sanli" are all five-words ancient poetry of narrative. Moreover, "Longshan Official" corresponded to "Shihao Official", "Bochi Official" corresponded to "Xin'an Official", "Hainan Official" corresponded to "Tongguan Official", Ding Ruoyong's poems had learned Du Fu's poems comprehensively, included rhymes and words. In terms of the theme, Ding Ruoyong's "Sanli" portrayed a great famine during the Li Dynasty, and Du Fu's "Sanli" were described the Anshi Rebellion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The two groups of poetic times and backgrounds were different, but they all described the social reality profoundly, reflected the suffering of the people's livelihood, practiced the ironic spirit of "*The Book of Songs*", rectified a king, and displayed the emotional tone of worrying about the country and the people.

In addition, unlike Du Fu's "Sanli" used the first-person perspective and expressed the poet's own revealed insights in the narrative, Ding Ruoyong's "Sanli" used the third-person perspective, gave objective descriptions or insights by a standpoint of the observer. These distinctions can be regarded as the transformation of Du Fu's "Sanli".

**Keywords:** Ding Ruoyong, Du Fu, Sanli, The Book of Songs, Reception.

## 一、前言

丁若鏞（1762-1836），字美庸、頌甫，號俟庵、茶山、洌水、與猶堂，是李氏朝鮮時期著名的詩人、經學家、實學思想之集大成者，治學強調經世致用、實事求是。他出身兩班貴族家庭，二十二歲中進士，二十八歲文科及第，歷任司憲府持平、司諫院正言、弘文館修撰、京畿暗行御史、奎瀛府校書、谷山府使、刑曹參議等職，為官剛正不阿、清廉自持，深得朝鮮正祖李祘的賞識與重用。正祖在位之二十四年（1800），突然駕崩，年幼的純祖李玘繼位。純祖元年（1801），在大王大妃金氏垂簾聽政

下，朝廷展開鎮壓天主教的行動，史稱「辛酉教獄」，丁若鏞因受牽連而被流配康津，開始長達十八年的流放生活，也使他得以貼近平民百姓，更能體察民生疾苦。純祖十八年（1818），丁若鏞遇赦回歸故里，不復為官，潛心治學、著述和遊歷。

丁若鏞爛習《詩經》，著有《詩經講義》、《詩經講義補遺》，認為《詩經》的特質乃「溫柔激切者」。<sup>1</sup>他敬慕唐代詩人杜甫（712-770），喜讀杜詩，十三歲時，「手抄杜詩，倣而步韻，深得杜意，凡數百首」<sup>2</sup>，其〈寄淵兒〉一文云：「杜詩用事無跡，看來如自作，細察皆有本，所以為聖。」<sup>3</sup>即讚美詩聖杜甫運用典故之渾然天成。文中亦指出：「後世詩律，當以杜工部為孔子。蓋其詩所以冠冕百家者，以得三百篇遺意也。三百篇者，皆忠臣孝子烈婦良友惻怛忠厚之發，不愛君憂國非詩也，不傷時憤俗非詩也，非有美刺勸懲之義非詩也。故志不立，學不醇，不聞大道，不能有致君澤民之心者，不能作詩。」<sup>4</sup>更推崇杜甫為詩中孔子，標榜繼承《詩經》諷諭傳統的杜詩精神：愛君憂國，傷時憤俗，美刺勸懲，致君澤民。

作為杜詩的忠實讀者，丁若鏞曾寫下許多仿杜或次韻杜詩的詩作，丁若鏞「三吏」（〈龍山吏〉、〈波池吏〉、〈海南吏〉）即仿效杜甫「三吏」（〈石壕吏〉、〈新安吏〉、〈潼關吏〉）而作。職是之故，本論文分別析論：杜甫「三吏」與丁若鏞「三吏」的寫作背景及內容大要、丁若鏞「三吏」對杜甫「三吏」的接受、丁若鏞「三吏」對杜甫「三吏」的轉化，俾能瞭解杜甫「三吏」對丁若鏞「三吏」的啟發和影響，意欲以「三吏」為詮釋主軸來釐清杜甫（杜詩作者）與丁若鏞（杜詩讀者）之間的交流情況，<sup>5</sup>從而印證杜甫「三吏」的美學內涵與價值，亦為體現杜詩文學史意

<sup>1</sup> 參見朝鮮·丁若鏞，《與猶堂全書》（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2002年），第1集，卷11，頁242。參見金興圭，《朝鮮後期詩經論與詩意識》（首爾：高麗大學校民族文化研究所，1995年），頁213。

<sup>2</sup> 見丁奎英，《俟菴先生年譜》（首爾：文獻編纂委員會，1961年），頁4。

<sup>3</sup> 見丁若鏞，《與猶堂全書》，第1集，卷21，頁453。

<sup>4</sup> 見丁若鏞，《與猶堂全書》，第1集，卷21，頁453。

<sup>5</sup> 文藝理論家阿布拉姆斯（M. H. Abrams）即認為：「文學是人性的作者與人性的讀者之間進行的一種交往。作家憑藉其語言能力與文學天才，把他對於人類以及人類活動的關懷加以現實化，並且用語言文字把它記錄下來。他以這種方式向讀者敞開他自己，而讀者也具有理解他的作品的相應能力。」見伊麗莎白·弗洛恩德（Elizabeth Freund）著，陳燕谷譯，《讀者反應理論批評》（臺北：駱駝出版社，1994年），頁13。

義的一種途徑。<sup>6</sup>

## 二、杜甫「三吏」與丁若鏞「三吏」的寫作背景及內容大要

唐肅宗乾元元年（758）冬，郭子儀收復長安、洛陽二都不久，與李光弼、王思禮等九節度使乘勝進擊，率數十萬兵力包圍安慶緒的軍隊於相州（即鄴城），情勢大好。不過，唐肅宗對郭子儀、李光弼等將領並不信任，因此指派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監軍，諸軍不設統帥，事權不一，加上糧食不足，士氣低落。乾元元年（759）春，史思明援軍至，情勢為之逆轉，唐軍遂遭相州大敗，安史叛軍進逼，郭子儀只得退保洛陽，其餘各節度使亦逃歸本鎮駐守。如若東都洛陽再次陷落，安史叛軍勢必進攻西都長安，作為關中屏障的潼關終將面臨一場惡戰。相州大敗後，唐朝官軍傷亡離散，兵員不足，朝廷急令徵兵，甚且肆意抽丁抓人來補充兵力。時任華州司功參軍的杜甫正由洛陽省親返回華州，路經新安、石壕、潼關等地，耳聞目睹男女老少被官吏捕捉充當兵士、役夫的情景，感受將士辛苦緊迫的備戰氛圍，悲憫百姓遭逢戰亂、不得不為國效力的困境，於是寫下了「三吏」，即〈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這一組詩。

〈新安吏〉描寫杜甫路過新安，耳聞目睹官吏按戶籍名冊徵兵之事：

客行新安道，喧呼聞點兵。借問新安吏，縣小更無丁？  
府帖昨夜下，次選中男行。中男絕短小，何以守王城。  
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  
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  
我軍取相州，日夕望其平。豈意賊難料，歸軍星散營。  
就糧近故壘，練卒依舊京。掘壕不到水，牧馬役亦輕。  
況乃王師順，撫養甚分明。送行勿泣血，僕射如父兄。<sup>7</sup>

唐軍新敗，從杜甫與新安吏的問答中，可知在兵員不足的情形下官府強

<sup>6</sup> 美學家姚斯（Hans Robert Jauss）指出：「美學的內涵就在於讀者對一部作品的第一次接受，包括由此比較閱讀過的作品，對其美學價值的檢驗。它的明顯歷史內涵是受來自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受鏈條的限制或擴充的理解；這樣，一部作品的歷史意義得到確定，它的美學價值得到證實。」見羅勃 C·赫魯伯（Robert C. Holub）著，董之林譯，《接受美學理論》（臺北：駱駝出版社，1994 年），頁 62。

<sup>7</sup> 見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卷 217，頁 2283。

徵中男（指未達服役年齡的青少年）入伍以補充兵力。昨夜徵兵，今日啓程，顯見東都洛陽的情勢危急，大戰一觸即發。詩人寬慰從軍的中男及其家人的同時，實亦表露寄望官軍將帥體恤士卒、早日平息叛亂之意。

〈石壕吏〉是杜甫途經石壕村時所作，敘述官吏深夜抓人、老翁越牆逃走、老婦被迫應役等所見所聞：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看。  
 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  
 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  
 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有孫母未去，出入無完裙。  
 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  
 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sup>8</sup>

杜甫清楚記下老婦對官吏說的話，呈現亂世之中家門不幸的控訴：老婦的三個兒子被徵召從軍，其中兩個戰死在相州，活著的一個兒子仍在軍中而前途未卜，家中只剩老弱婦孺，生活貧困。即使如此，官吏仍要抓人充役，老婦只好勉為其難而挺身應役。

〈潼關吏〉乃杜甫經過潼關時看見士兵辛苦修築防禦工事而作：

士卒何草草，築城潼關道。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  
 借問潼關吏，修關還備胡？要我下馬行，爲我指山隅。  
 連雲列戰格，飛鳥不能踰。胡來但自守，豈復憂西都。  
 丈人視要處，窄狹容單車。艱難奮長戟，萬古用一夫。  
 哀哉桃林戰，百萬化爲魚。請囑防關將，慎勿學哥舒。<sup>9</sup>

杜甫根據自己看見的情景及其與潼關吏的問答，揭示：潼關地勢險要，士卒辛苦依山修築的城關既堅固又高峻、作戰部署亦甚為嚴密，而且士氣高昂，應可有效抵禦安史叛軍西進。不過，個性審慎的詩人還是警惕將士們須堅守城關，記取歷史教訓，不要重蹈當年哥舒翰輕率出關應戰而慘敗的覆轍。

比杜甫的「三吏」晚一千餘年，丁若鏞的「三吏」作於李朝純祖十年（1810），當時朝鮮大旱，丁若鏞在流配地康津親眼目睹百姓饑饉的慘

<sup>8</sup> 見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卷 217，頁 2283。

<sup>9</sup> 見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卷 217，頁 2283。

狀，他在四言詩〈采蒿〉注云：「己巳歲，余在茶山草菴。是歲大旱，爰自冬春，至于立秋，赤地千里，野無青草。六月之初，流民塞路，傷心慘目，如不欲生。」<sup>10</sup>康津一帶的百姓原本在名目繁多的賦稅壓迫下已經苦不堪言，又遭遇大荒之年，生計更加艱難，即便如此，官吏卻不體恤百姓窮困的處境，嚴厲執行國家苛刻的賦稅政策，橫徵暴斂如故，有鑑於此，丁若鏞乃仿效杜甫作「三吏」而作的〈龍山吏〉、〈波池吏〉、〈海南吏〉，揭露苛酷的官吏催繳租稅、掠奪財物的行徑，反映民不聊生的苦痛。

〈龍山吏〉描繪出催稅官吏不顧百姓死活、只圖奉承上意的惡行：

吏打龍山村，搜牛付官人。驅牛遠遠去，家家倚門看。  
勉塞官長怒，誰知細民苦。六月索稻米，毒痛甚征戍。  
德音竟不至，萬命相枕死。窮生儘可哀，死者寧嗇矣。  
婦寡無良人，翁老無兒孫。泫然望牛泣，淚落沾衣裙。  
村色劇疲衰，吏坐胡不歸？瓶甕久已罄，何能有夕炊。  
坐令生理絕，四隣同嗚咽。脯牛歸朱門，才譖以甄別。<sup>11</sup>

到龍山村催稅的官吏怕長官生氣、爲了討好上司而強搶耕牛，被搶走耕牛的，有的是寡婦，有的是孤苦的老翁，面對官吏殘酷的剝削、掠奪，他們毫無反抗之力，只能絕望流淚，眼睜睜地看著耕牛被搶走。百姓家中早已缺糧，又失去作爲謀生依據的耕牛，最後恐怕只能餓死。惡吏不擇手段地搶走耕牛，留下可憐的農民和凋蔽的村家，只爲向長官獻媚、使自己升官，草菅人命亦在所不惜。

〈波池吏〉敘述官吏到村中催繳租稅，非但不體恤災荒之下百姓生計艱難，還理直氣壯地捉捕孤寡、欺凌貧士，恣意妄爲：

吏打波池坊，喧呼如點兵。疫鬼雜餓莩，村墅無農丁。  
催聲縛孤寡，鞭背使前行。驅叱如犬雞，彌亘薄縣城。  
中有一貧士，瘠弱最伶俜。號天訴無辜，哀怨有餘聲。  
未敢叙衷臆，但見涕縱橫。吏怒謂其頑，僂辱怵衆情。  
倒懸高樹枝，髮與樹根平。鰥生瞽不畏，敢爾逆上營。  
讀書會知義，王稅輸王京。饒爾到季夏，念爾恩非輕。

<sup>10</sup> 見丁若鏞，《與猶堂全書》，第1集，卷5，頁104。

<sup>11</sup> 見丁若鏞，《與猶堂全書》，第1集，卷5，頁105-106。

我舸滯浦口，爾眼胡不明？立威更何時，指揮有公兄。<sup>12</sup>

官吏來到飽受瘟疫與饑荒摧殘的村莊，喧嚷著要僅存的孤寡人家繳納王稅，百姓卻無力繳稅，官吏大怒，捆綁、鞭打孤寡之人，以抗稅的名義要將他們抓到縣城。有一位貧困的士人大聲控訴、抗議官吏的暴虐，官吏竟將他倒掛在樹上、大加責罵，直言：「朝廷已寬限至季夏，如今運送稅糧的船已等在浦口，讀書人豈能不明白繳納王稅的道理？」意圖懲一儆百，藉以向村民施壓、逼稅。

〈海南吏〉由一位逃避海南官吏催租而遠走他鄉的平民獨白，道出可怕的經歷：

客從海南來，為言避畏途。坐久喘未定，怖怯猶有餘。  
若非值豺狼，定是遭羌胡。催租吏出村，亂打東南隅。  
新官令益嚴，程限不得踰。橋司萬斛船，正月離王都。  
滯船必黜官，鑑戒在前車。嗷嗷百家哭，可以媚權夫。  
吾今避猛虎，誰復恤枯魚。泫然雙淚垂，條然一嘯舒。<sup>13</sup>

客子倉皇避稅離鄉、驚慌未定；催租官吏則催逼孔急，手段好像「豺狼」、「羌胡」一般橫暴，他們為了不讓自己的宦途受影響，嚴厲逼迫百姓在規定的期限內上繳租稅，導致村中呈現「嗷嗷百家哭」的淒慘景象。

### 三、丁若鏞「三吏」對杜甫「三吏」的接受

誠如文學批評家伊麗莎白·弗洛恩德(Elizabeth Freund)所指出：「文學文本是一個獨特的、完整的和自足的語言實體，它那公認的渾然一體的存在就是批評詮釋的對象：一種溝通作者與讀者這兩極的交流方式，作者與讀者分享著同一套語言和文學代碼(code)，因而可以傳送並接受確定的意義。」<sup>14</sup>此說實可以佐證本論文對杜甫(杜詩作者)「三吏」與丁若鏞(杜詩讀者)「三吏」之間交流情況的分析。

丁若鏞「三吏」和杜甫「三吏」在形式上都屬五言古詩。五言古詩不限句數，不講究平仄和對仗，可以換韻，且鄰韻可以通押，亦即表達

<sup>12</sup> 見丁若鏞，《與猶堂全書》，第1集，卷5，頁106。

<sup>13</sup> 見丁若鏞，《與猶堂全書》，第1集，卷5，頁106。

<sup>14</sup> 見伊麗莎白·弗洛恩德(Elizabeth Freund)著，陳燕谷譯，《讀者反應理論批評》，頁13。

上不受格律束縛，可以容納更多語句詞彙，形式靈活，更有利於敘事、抒情或議論，敘寫社會現實，反映民生疾苦，呈顯作者襟懷。

押韻方面，可以明顯看出丁若鏞「三吏」對杜甫「三吏」的接受。丁、杜兩組詩，兩相對應：〈龍山吏〉對應〈石壕吏〉、〈波池吏〉對應〈新安吏〉、〈海南吏〉對應〈潼關吏〉。〈龍山吏〉借用〈石壕吏〉的十八個韻腳：村、人、看、怒、苦、戍、至、死、矣、人、孫、裙、衰、歸、炊、絕、咽、別。〈波池吏〉借用〈新安吏〉的十四個韻腳：兵、丁、行、城、傳、聲、橫、情、平、營、京、輕、明、兄。〈海南吏〉則借用〈潼關吏〉十韻中的八個韻腳：餘、胡、隅、都、車、夫、魚、舒。〈海南吏〉首聯的韻腳為「途」，而〈潼關吏〉首聯的韻腳為「草」、「道」，是乃兩詩用韻不同處。顯而易見，除〈海南吏〉稍微例外，丁若鏞「三吏」幾乎兩相對應地次韻杜甫「三吏」。

丁若鏞「三吏」對杜甫「三吏」的語句詞彙亦不乏化用之處，例如：〈龍山吏〉中「窮生儘可哀，死者寧嗇矣」是對〈石壕吏〉中「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的化用；〈波池吏〉中的「喧呼如點兵」、「村墅無農丁」、「但見涕縱橫」分別化用自〈新安吏〉中的「喧呼聞點兵」、「縣小更無丁」、「收汝淚縱橫」；〈海南吏〉第五聯「不得踰」則是對〈潼關吏〉第五聯「不能踰」的化用。

寫作題材方面，丁若鏞「三吏」對杜甫「三吏」亦有所接受。杜甫〈新安吏〉寫官吏徵中男入伍、〈石壕吏〉寫官吏抓老婦應河陽役、〈潼關吏〉寫將士辛苦築城守潼關，丁若鏞〈龍山吏〉寫官吏搶奪耕牛、〈波池吏〉寫官吏逼稅、〈海南吏〉寫官吏催租，都是透過一個主要事件、情景來呈顯戰亂、荒旱、兵役、勞役、租稅等社會現實及其衍生的民生疾苦。杜甫〈新安吏〉中被迫從軍的中男、〈石壕吏〉中的被抓應役的老婦、〈潼關吏〉中築城守關的士卒，丁若鏞〈龍山吏〉中遭搶奪耕牛的寡婦和老翁、〈波池吏〉中被惡吏催租欺凌的孤寡和貧士、〈海南吏〉中避稅他鄉的客子，都是承受悲苦際遇的弱勢人物。

杜甫「三吏」作於安史之亂、唐軍相州敗戰之際，揭示朝廷亟需徵兵、戍役的社會現實，反映平凡百姓家庭破碎、生離死別的苦痛，記載唐代由盛轉衰的「詩史」。〈新安吏〉中詩人勸慰中男時說：「我軍取相州，日夕望其平。豈意賊難料，歸軍星散營。」即言及唐軍相州敗戰之事。



杜甫與新安吏的問答，更道出相州敗後朝廷徵兵迫切、無丁可徵而不惜波及幼小的窘況。〈潼關吏〉由詩人之眼呈現：「士卒何草草，築城潼關道。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凸顯相州敗後士兵強化潼關防禦的辛勞。〈石壕吏〉中老婦對官吏陳辭：「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有孫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亦是相州敗後徵兵孔急、驅盡壯丁甚且連累老婦的社會困境寫真。

丁若鏞「三吏」作於李氏朝鮮大荒之年，以詩歌批判朝廷惡政，客觀寫實地記錄小人物的遭遇，揭示「三政」制度積弊的同時，<sup>15</sup>詩人對李朝後期吏治敗壞、民生凋敝的憂慮，對百姓遭受官吏欺壓、剝削的悲憫，亦躍然紙上，亦不失為李氏朝鮮的歷史實錄。<sup>16</sup>所謂「三政」，乃「田政」、「軍政」和「還政」。「田政」是指官府按土地面積向下層人民徵稅；「軍政」是一種徵收軍布的服兵役形式，逐漸演變成一種附加稅；「還政」是指還穀，原本為具有賑恤性質的借貸，由政府貸給人民糧食或種子，春借秋還，但連本帶利後卻成了高利貸的剝削。換言之，「三政」制度以各種形式向人民攤派賦稅和勞役，變成各級官吏巧立名目、假公濟私、掠奪百姓生計的手段。而且收上來的租稅大多流入權門貴戚和地方胥吏、豪強手中，國庫日益空虛，百姓生活更加困頓。丁若鏞〈龍山吏〉寫道：「瓶甕久已罄，何能有夕炊。」〈波池吏〉寫道：「疫鬼雜餓莩，村墅無農丁。」即是憐憫遭逢饑荒之百姓生活艱難的觀照和表述。〈龍山吏〉指出：「六月索稻米，毒痛甚征戍。」〈波池吏〉藉官吏之口宣告：「讀書會知義，王稅輸王京。饒爾到季夏，念爾恩非輕。峩舸滯浦口，爾眼胡不明？立威更何時，指揮有公兄。」〈海南吏〉藉海南客獨白說：「新官令益嚴，程限不得踰。橋司萬斛船，正月離王都。滯船必黜官，鑑戒在前車。」要皆指陳賦稅制度的嚴苛無情，官吏為自身權位設想，厲行催繳和掠奪，毫不體恤民情。平凡百姓遭遇催租逼稅，卻無力反抗，人禍之患顯然更甚災荒，終究造成〈龍山吏〉中「德音竟不至，萬命相枕死」、

<sup>15</sup> 李曉萍指出：「丁詩中的『三吏』是詩人在李朝統治末期的大背景下對『三政』毒害百姓的事實的記錄和控訴。」見李曉萍，〈朝鮮詩人丁若鏞“三吏”與杜甫“三吏”之比較研究〉，《安康學院學報》第23卷第5期（2011年10月），頁78。

<sup>16</sup> 參見王雪、楊新民、邵希芸，〈杜甫對朝鮮詩人丁若鏞詩歌創作的影響〉，《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3期，頁71。

〈海南吏〉中「嗷嗷百家哭，可以媚權夫」的慘況。

詩歌的體制與主題之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杜甫「三吏」和丁若鏞「三吏」對《詩經》諷諭精神的傳承。

《毛詩正義·大序》明言：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sup>17</sup>

詩歌乃詩人情志之抒發，而「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的亂世刑政苛虐、風俗澆薄，致使詩人抒情發憤，以風刺上、主文譎諫，企盼藉由諷諭之詩達到移風易俗、恢復禮義的積極目的。誠然，《詩經》不僅是抒情文學的重要著作，〈國風〉尤其表達了詩人對社會現實的批判與對居上位者的諷諫，反映了當時的國政良窳與民生疾苦，例如〈國風·魏風·碩鼠〉<sup>18</sup>刺重斂、〈國風·唐風·鴛羽〉<sup>19</sup>刺時、〈國風·衛風·氓〉<sup>20</sup>刺時等。

<sup>17</sup> 見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清·阮元校勘，《毛詩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卷1，頁12-17。

<sup>18</sup> 參見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清·阮元校勘，《毛詩正義》，卷5，頁211。

<sup>19</sup> 參見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清·阮元校勘，《毛詩正義》，卷6，頁224。

<sup>20</sup> 參見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清·阮元校勘，《毛詩正義》，卷3，頁134。

前引丁若鏞〈寄淵兒〉一文，謂杜詩得三百篇遺意，這是丁若鏞敬慕杜甫的重要原因。觀杜甫〈戲爲六絕句〉其三說：「縱使盧王操翰墨，劣于漢魏近風騷。」<sup>21</sup>其六云：「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sup>22</sup>可見他對《詩經》甚爲重視。杜甫〈敬贈鄭諫議十韻〉曰：「諫官非不達，詩義早知名。」<sup>23</sup>〈毒熱寄簡崔評事十六弟〉云：「載聞大易義，諷興詩家流。」<sup>24</sup>已然肯認《詩經》的諷諫之意；又觀陸游〈宋都曹屢寄詩且督和答作此示之〉指出：「古詩三千篇，刪取財十一。……天未喪斯文，杜老乃獨出。」<sup>25</sup>宋濂《杜詩學隅序》曰：「杜子美詩實取法三百篇，有類〈國風〉者，有類〈雅〉、〈頌〉者。」<sup>26</sup>又乾隆皇帝〈杜子美詩序〉云：「子美之詩，所謂道性情而有勸懲之實者也。」<sup>27</sup>則學者關於杜詩繼承《詩經》諷諭精神的認知亦可見一斑。且杜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寫道：「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sup>28</sup>他繼承《詩經》諷諭精神來寫作詩歌之積極目的，即在於匡正君主、移風易俗，欲使君主成爲堯、舜一般的明君，讓風俗再現淳樸。

與杜甫一樣，丁若鏞對《詩經》極爲重視與熟稔，如其《詩經講義補遺》云：

風有二義，亦有二音，指趣迥別，不能相通。上以風化下者，風教也，風化也，風俗也，其音爲平聲。下以風刺上者，風諫也，風刺也，諷喻也，其音爲去聲。安得以一風字，雙含二義，跨據二音乎？……風也者，諷也。託意微言，陳善閉邪，風之妙也。假如佩玉晏鳴，陳〈關雎〉以風之。征役煩勞，歌〈殷雷〉以風之。帷薄不修，賦〈牆茨〉以風之。琴瑟不諧，誦〈綠衣〉以風之。不舉時政，唯陳古道；不舉時疵，唯述前鑒。此所以感發人之善心，懲創人之逸志

<sup>21</sup> 見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卷 227，頁 2453。

<sup>22</sup> 見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卷 227，頁 2453。

<sup>23</sup> 見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卷 224，頁 2389。

<sup>24</sup> 見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卷 221，頁 2339。

<sup>25</sup> 見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卷 79，頁 4276。

<sup>26</sup> 見明·宋濂：《宋學士文集》（臺北：商務印書館，1967 年），卷 37，頁 9 下。

<sup>27</sup> 見清·愛新覺羅·弘曆，《樂善堂全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冊 331，卷 7，頁 5b- 6b。

<sup>28</sup> 見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卷 216，頁 2252。

也，此國風之所以為風，豈僅為民俗歌謠之之作而已哉？<sup>29</sup>

丁若鏞認為《毛詩正義·大序》將「風」理解為具有「風化」和「風刺」二種涵義的並不正確，他指出「風」是「諷」之義，應讀作去聲，而將「風」詮釋為「諷刺」、「諷諫」和「諷諭」，<sup>30</sup>沈慶昊亦指出：「《毛詩正義》認為『作詩』是對臣下的諷刺，『用詩』是對君主的風化。……但是丁若鏞從『作詩』與『用詩』兩個角度，都將『風』理解為『諷刺』。他認為國風中所有的詩都是以諷刺君主為前提的。既然詩歌的用處在此，那麼創作詩歌的目的也只能理解為是對君主進行諷諫。」<sup>31</sup>《詩經講義補遺》又云：「風、雅二者，體裁雖別，其歸則感發人之善心，懲創人之逸志也。正言曰雅，微喻曰風。」<sup>32</sup>除了〈國風〉之外，丁若鏞認為〈雅〉也是諷諫人主之詩。他的〈自撰墓誌銘〉曾言：「《詩》者，諫林也。……使王者聞其善而感發，聞其惡而懲創。故《詩》之褒貶，嚴於《春秋》，人主畏之。」<sup>33</sup>已然進一步賦予《詩經》諫書的功能。<sup>34</sup>《詩經講義補遺·小序》云：

凡〈國風〉之所美刺，皆是公家之善惡。或居室大族，行有淑慝，係國家之存亡，關世道之汙隆，方有美刺之詞。朱子一歸之於下俚閭巷之音，此恐未允。……故〈國風〉諸詩，亦唯以「一正君」為務。或美之贊之，以感其善心；或刺之箴之，以懲其逸志。君心既正，百官自正；百官既正，天下歸仁。<sup>35</sup>

丁若鏞對朱熹《詩集傳》將〈國風〉界定為民間歌謠的見解提出批判，丁若鏞認為〈國風〉中的詩都是為匡正君心而創作和使用的，金秀炅指

<sup>29</sup> 見丁若鏞，《與猶堂全書》，第 2 集，卷 20，頁 463。

<sup>30</sup> 參見李俸珪，〈韓國學界關於茶山學研究的焦點〉，收入黃俊傑編：《東亞儒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 年），頁 192。

<sup>31</sup> 見沈慶昊著、金梅鷹譯，〈丁若鏞的《詩經》論與清朝學術的關係：以繼承、批判毛奇齡學說為例〉，收入黃俊傑編，《東亞視野中的茶山學與朝鮮儒學》（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6 年），頁 141-142。

<sup>32</sup> 見丁若鏞，《與猶堂全書》，第 2 集，卷 20，頁 463。

<sup>33</sup> 見丁若鏞，《與猶堂全書》，第 1 集，卷 16，頁 345。

<sup>34</sup> 參見沈慶昊著、金梅鷹譯，〈丁若鏞的《詩經》論與清朝學術的關係：以繼承、批判毛奇齡學說為例〉，收入黃俊傑編：《東亞視野中的茶山學與朝鮮儒學》，頁 143。付星星，〈朝鮮時代儒者丁若鏞《詩經講義》譎論〉，《古典文獻研究》2015 年第 2 期（2015 年 6 月），頁 174。

<sup>35</sup> 見丁若鏞，《與猶堂全書》，第 2 集，卷 20，頁 465。

出：「丁若鏞之所以刻意區分教化與風刺之義，就是為了突出《詩》的社會批判功能。」<sup>36</sup>劉麗亦提及：「《詩經》風雅精神的另一層面是『政治道德意識強烈』，丁若鏞作為一名憂國恤民的詩人對詩歌針砭時政的功能十分看重，他在自己的《詩經》觀中也一再強調詩歌要做到『美刺勸懲』，因此，也創作了一批諷刺惡吏貪官、批判不合理政治制度的詩歌，這些批判諷刺弊政的詩歌是其政治道德意識強烈的重要表現。」<sup>37</sup>質言之，丁若鏞不僅與杜甫一樣肯認《詩經》的諷諫之意，在詩歌創作上繼承了《詩經》的諷諭精神，更進一步要經世致用、致君澤民，亦即與杜甫「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憧憬若合符節，希望能夠實踐匡正君心、革除時弊的政治理想。

杜甫在安史之亂前作〈兵車行〉已指陳：「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況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雞。長者雖有問，役夫敢申恨？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是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sup>38</sup>安史之亂爆發以後作〈悲陳陶〉更描述：「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陳陶澤中水。野曠天清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sup>39</sup>戰爭慘烈無情、地方官吏橫徵暴斂所造成的民生疾苦昭然若揭，字裡行間亦流露出詩人對戰禍與人禍的批判，已然繼承了《詩經》的諷諭精神。

丁若鏞〈飢民詩〉：「林林生蒸民，憔悴含瘡痍。槁莖弱不振，道塗逢流離。負戴靡所聘，不知竟何之。骨肉且莫保，迫厄傷天彝。上農為丐子，扣門拙言辭。」<sup>40</sup>〈山翁〉：「大兒槃散手一瓢，小兒薦黃顏色焦。井上一兒特枯瘦，腹如怒蟾臀皮皺。」<sup>41</sup>描寫荒年百姓生活的饑貧困頓，〈耽津村謠二十首·其三〉：「園丁日日培新笋，留作朱門竹瀝膏。」<sup>42</sup>〈長

<sup>36</sup> 見金秀炅，《韓國朝鮮時期詩經學研究》（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頁214。

<sup>37</sup> 見劉麗，《丁若鏞《詩經》接受研究—以詩經觀和漢詩創作為中心》（威海：山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年），頁38。

<sup>38</sup> 見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卷216，頁2255。

<sup>39</sup> 見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卷216，頁2268。

<sup>40</sup> 見丁若鏞，《與猶堂全書》，第1集，卷2，頁32。

<sup>41</sup> 見丁若鏞，《與猶堂全書》，第1集，卷5，頁103。

<sup>42</sup> 見丁若鏞，《與猶堂全書》，第1集，卷4，頁81。

髻農歌十章·其四):「平生不種西瓜子, 剛怕官奴惹是非。」<sup>43</sup>〈耽津農歌〉:「豈惟蓮子輸官裡, 兼怕官人暇日漁。」<sup>44</sup>批判貪官酷吏的剝削掠奪, 在在都是繼承《詩經》諷諭精神之例證, 亦可以視為丁若鏞學習、效法杜詩的具體表現之一。

杜甫「三吏」(〈石壕吏〉、〈新安吏〉、〈潼關吏〉)凸顯安史之亂下不合理的兵役制度, 丁若鏞「三吏」(〈龍山吏〉、〈波池吏〉、〈海南吏〉)凸顯李朝末年不公義的賦稅制度, 兩組詩皆流露憂國憂民、悲天憫人的情感基調, 而批判「苛政猛於虎」可說是兩組詩一脈相承的主題思想。<sup>45</sup>換言之, 丁若鏞「三吏」寫照李氏朝鮮饑荒之年, 杜甫「三吏」記敘中國唐代安史之亂, 年代、背景固然不同, 卻都繼承與實踐了《詩經》傷時憤俗、美刺勸懲、以風刺上的諷諭精神, 流露憂國憂民、悲天憫人的情懷。<sup>46</sup>

#### 四、丁若鏞「三吏」對杜甫「三吏」的轉化

朝鮮詩人丁若鏞「三吏」與杜甫「三吏」之寫作年代、背景不同, 寫作手法亦有所差異。這樣的情況, 類似葉維廉《比較詩學》一書評論美國詩人史迺德的詩例時所強調:「如果我們仔細的比對這兩個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時代的詩的操作程序, 其匯通處是很顯著的, 但由於文化的不同, 歧異之處亦不難發現。」<sup>47</sup>所謂丁若鏞「三吏」對杜甫「三吏」的轉化, 指的便是兩組詩之間的存在轉變、歧異。

杜甫的〈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具體而微地刻畫出安史之亂所引發的徵兵、戍役等社會現實, 感同身受地反映了戰亂下的民生疾苦。值得注意的是, 杜甫不僅是「三吏」的作者, 也是安史之亂的親身經歷者, 因此, 在敘事寫人的同時, 他往往介入詩作文本, 成為詩中的角色。在〈新安吏〉中, 杜甫是走在新安道上的過客, 因為聽到徵兵的喧呼聲而向新安吏發問:「縣小更無丁?」新安吏回答:「府帖昨夜下,

<sup>43</sup> 見丁若鏞,《與猶堂全書》,第1集,卷4,頁77。

<sup>44</sup> 見丁若鏞,《與猶堂全書》,第1集,卷4,頁82。

<sup>45</sup> 參見李曉萍,〈朝鮮詩人丁若鏞“三吏”與杜甫“三吏”之比較研究〉,頁78。

<sup>46</sup> 丁若鏞透過詩作反映社會現實,亦特別強調「美刺勸懲」的教育作用。參見李岩、徐健順,《朝鮮文學通史》(上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冊下,頁1280。韋旭升,《朝鮮文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頁405。

<sup>47</sup> 見葉維廉,《比較詩學》(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3年),頁77。

次選中男行。」杜甫提出質疑：「中男絕短小，何以守王城？」接下去新安吏就沒有答話了。然而杜甫透過自己的所見所聞，揭示徵兵現場的殘酷景象，凸顯出官府為補充兵力而肆意徵兵拉夫的苛刻無情。此詩有二十餘句是作者杜甫自己的陳述，敘事當中還包含著杜甫對中男及其家人的勸慰。在〈潼關吏〉中，杜甫目睹「士卒何草草，築城潼關道」的辛勞以及「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的堅固，而向潼關吏提問：「修關還備胡？」潼關吏則邀請杜甫下馬步行、指著山隅向他介紹：「連雲列戰格，飛鳥不能踰。胡來但自守，豈復憂西都？丈人視要處，窄狹容單車。艱難奮長戟，萬古用一夫。」由作者與官吏的問答之間，不難窺見潼關防禦工事堅如磐石和守關將士鬥志高昂等事實。即便如此，杜甫不忘提醒將士堅守潼關、牢記哥舒翰曾經率出戰而招致慘敗的前車之鑑。〈石壕吏〉描寫杜甫夜宿石壕村後眼見耳聞役吏橫暴捉人時老翁越牆逃走、老婦被迫應役的窘迫情態，作者在這首詩中雖然沒有說話，卻是感同身受的旁觀者，他清楚記錄老婦對役吏的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唯有乳下孫。有孫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戰亂造成平凡百姓家庭破碎、生離死別的苦痛由此可見一斑。杜甫介入詩作文本，成為詩中事件情節發展的參與者，作者的介入，使「三吏」中點兵、築城、捉人種種情事歷歷在目，富有臨場感和真實性。杜甫的「三吏」，多以作者的第一人稱視角來敘事寫人，詩中既有杜甫對自己言行、見聞的主觀描述，亦有對場景、事態之客觀敘寫，可以說是一種「主客融合」的寫作手法。<sup>48</sup>

在杜甫「三吏」的客觀敘事當中，時常伴隨著他個人主觀情感和議論的表露。〈新安吏〉寫道：「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敘述中男從軍的別離景象，杜甫描繪白水在暮色中無語東流，感覺青山好像帶著哭聲，這如真似幻的寫作手法，實蘊含詩人與中男同悲的主觀感受。〈新安吏〉中杜甫寬慰被強徵入伍的中男和他的家人：「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掘壕不到水，牧馬役亦輕。況乃王師順，撫養甚分明。送行勿泣血，僕射如父

<sup>48</sup> 參見孫玉霞，《丁茶山與杜甫詩歌創作的比較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少數民族語言文學院博士學位論文，2010年），頁132。

兄。」從中可以體會杜甫對人民遭遇不公義的對待懷抱同情和諷諫，虛寫天地無情的體認，實則表達對朝廷急切徵兵的無奈，在批判兵役政策不合理的同時，基於對國家存亡的憂慮，杜甫不得不勸勉中男應徵赴役。換言之，詩人面臨憂國與愛民的價值矛盾，最後選擇勸勉人民捨棄私情、共赴國難。〈潼關吏〉篇末杜甫告誡將士牢記前車之鑑：「哀哉桃林戰，百萬化為魚。請囑防關將，慎勿學哥舒。」則顯示杜甫對即將爆發的潼關保衛戰之關注和審慎，亦體現詩人前事不忘、禦敵從嚴的識見。〈石壕吏〉開端描述役吏蠻橫捉人的情景：「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末尾側寫老婦被迫應役的結局說：「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除了道出杜甫對百姓遭受征役驅迫之苦的感同身受，更流露詩人無言以對、大悲無言的憐憫與無奈，而他對官吏強行徵兵拉夫的批判亦不言可喻。配合著詩人對自身言行及其與詩中人物互動的描寫，杜甫將自己的主觀感受、見解融入「三吏」的客觀敘事中，詩人主觀的愛憎褒貶時常映現在人事、場景的描述當中，容易令讀者感同身受，引發讀者的共鳴。袁行霽即認為杜甫：「記述的是時事，反映的是歷史的真實畫面，而抒發的是一己情懷。」<sup>49</sup>

與杜甫「三吏」不同的是，丁若鏞「三吏」中詩人盡量隱藏自己、淡化自己，作一個相對低調的觀察者與敘事者，不介入詩作文本，不成為事件情節中的角色。諸如〈龍山吏〉寫官吏為了討好上司而到龍山村搶走耕牛，留下村民「坐令生理絕，四隣同嗚咽」的困境，作者在最後提出諷刺意味的論斷：「脯牛歸朱門，才譎以甄別。」當村民賴以維生的耕牛被以稅收的名義搶走後，勢必要被官吏做成牛肉脯奉獻給上司，成為官吏升官進階的憑藉。〈波池吏〉寫官吏到波池村去催繳租稅，「催聲縛孤寡，鞭背使前行」，致使貧士「號天訴無辜，哀怨有餘聲」，詩人藉由官吏責備貧士時的「立威更何時，指揮有公兄」一語，揭發那催促「王稅輸王京」的官吏實仰仗權勢、耀武揚威而不惜欺凌百姓的醜惡本質。〈海南吏〉由逃避租稅而遠走他鄉的海南平民悲苦獨白，揭示官吏在當地蠻橫催繳租稅，由於「新官令益嚴，程限不得踰」，導致「嗷嗷百家哭，可以媚棹夫」的慘狀，詩人藉客子之口道出「吾今避猛虎，誰復憐枯魚」的感慨和同情。凡此，詩人多從旁觀察、敘寫，客觀揭示詩中人物的遭

<sup>49</sup> 見袁行霽主編，《中國文學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卷，頁235。



遇、事件的發展，組詩中沒有丁若鏞對自己言行的敘述，也不見詩人與詩中人物互動的描寫。

不同於杜甫「三吏」多採用第一人稱視角、詩人介入敘事當中抒發眼見耳聞的主觀感受與見解；丁若鏞「三吏」多採用第三人稱視角，從旁觀者的立場理性、客觀地敘事、寫人或議論，詩人的好惡美刺仍相對內斂地寄寓在詩作中，是一種「主客分離」的寫作手法，<sup>50</sup>可以視為對杜甫「三吏」的轉化。

如果說杜甫「三吏」的寫作手法類似導演、編劇自己介入戲劇或電影中軋一角；丁若鏞「三吏」中場景、事件之描寫有時彷彿戲劇或電影中的「定格」特寫。<sup>51</sup>〈龍山吏〉中，詩人把鏡頭定格在官吏搜牛而去的情景：「吏打龍山村，搜牛付官人。驅牛遠遠去，家家倚門看。」官吏牽著搶奪的耕牛漸行漸遠，龍山村的百姓只能無助地倚在門邊悲傷張望，而官吏不顧百姓死活的心態昭然若揭。〈波池吏〉中，詩人把鏡頭定格官吏折磨、欺侮貧士的情景：「吏怒謂其頑，僂辱怵衆情。倒懸高樹枝，髮與樹根平。」官吏將貧士倒掛在高樹上，對其大加斥責、侮辱，藉以威迫百姓繳稅，而官吏蠻橫催租無所不用其極的行徑表露無遺。〈海南吏〉中詩人將鏡頭定格在海南平民因避稅作客他鄉、心有餘悸情景：「客從海南來，爲言避畏途。坐久喘未定，怖怯猶未餘。若非值豺狼，定是遭羌胡。」海南官吏催租時的殘酷可怕不言可喻。這種類似銀幕上映出的活動影像驟然停止而成爲靜止畫面、用以突出或渲染某一場景、情態或細節的「定格」特寫，有效點出詩的主題，詩人著力於冷肅而客觀地敘寫、議論那荒謬無情卻又無力反轉的社會現實，實有助於強化、深化讀者對現實的認識和省思，時而激越讀者的心弦。

## 五、結語

丁若鏞「三吏」對杜甫「三吏」的接受，主要表現組詩的體制與主題思想兩方面：體制方面，丁若鏞「三吏」與杜甫「三吏」皆是以敘事爲主體的五言古詩，而且〈龍山吏〉對應〈石壕吏〉、〈波池吏〉對應〈新安吏〉、〈海南吏〉對應〈潼關吏〉，除〈海南吏〉中稍有例外，丁若鏞「三

<sup>50</sup> 參見孫玉霞，《丁茶山與杜甫詩歌創作的比較研究》，頁 134。

<sup>51</sup> 參見孫玉霞，《丁茶山與杜甫詩歌創作的比較研究》，頁 135。

吏」幾乎兩相對應地全面次韻杜甫「三吏」、借用杜詩的韻腳，語句詞彙也多有化用之處。主題思想方面，丁若鏞「三吏」作於李氏朝鮮大荒之年，諷刺「三政」制度的積弊，寄寓對李朝後期吏治敗壞、民生凋敝的憂慮，流露對百姓遭受官吏欺壓、剝削的同情；杜甫「三吏」作於安史之亂、唐軍相州敗戰之際，揭示朝廷急迫徵兵、戍役的社會現實，悲憫百姓家庭破碎、生離死別的苦痛。兩組詩寫作年代、背景不同，卻都深刻描繪社會現實，反映民生疾苦，繼承《詩經》傷時憤俗、美刺勸懲、以風刺上的諷諭精神，不僅蘊含匡正君心、革除時弊的經世思想，更呈顯出憂國憂民、悲天憫人的情感基調。

杜甫的「三吏」，多以作者的第一人稱視角來敘事寫人，詩中既蘊含杜甫對自己言行、見聞的主觀描述，詩人的愛憎褒貶時常映現在人事、場景的描述當中，容易令讀者感同身受，引發讀者的共鳴。丁若鏞「三吏」多採用第三人稱視角，作者低調地隱藏自己、淡化自己，冷肅地以旁觀者的立場理性、客觀地敘事、寫人或議論，而詩人的好惡美刺實寓含在字裡行間，時而激越讀者的心弦，可謂對杜甫「三吏」的轉化。

## 參考文獻

### (一)古籍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清〕阮元校勘：《毛詩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明·宋濂，《宋學士文集》（臺北：商務印書館，1967年）。

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

清·愛新覺羅·弘曆，《樂善堂全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朝鮮·丁若鏞，《與猶堂全書》（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2002年）。

### (二)近人專著

丁奎英，《俟菴先生年譜》（首爾：文獻編纂委員會，1961年）。

伊麗莎白·弗洛恩德（Elizabeth Freund）著，陳燕谷譯，《讀者反應理論

- 批評》(臺北：駱駝出版社，1994年)。
- 李岩、徐健順，《朝鮮文學通史》(上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
- 金秀炅，《韓國朝鮮時期詩經學研究》(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
- 金興圭，《朝鮮後期詩經論與詩意識》(首爾：高麗大學校民族文化研究所，1995年)。
- 韋旭升，《朝鮮文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
- 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
- 黃俊傑編，《東亞視野中的茶山學與朝鮮儒學》(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6年)。
- 黃俊傑編，《東亞儒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年)。
- 葉維廉，《比較詩學》(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3年)。
- 羅勃 C·赫魯伯 (Robert C. Holub) 著，董之林譯，《接受美學理論》(臺北：駱駝出版社，1994年)。

### (三)期刊論文

- 王雪、楊新民、邵希芸，〈杜甫對朝鮮詩人丁若鏞詩歌創作的影響〉，《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3期，1995年3月。
- 付星星，〈朝鮮時代儒者丁若鏞《詩經講義》謏論〉，《古典文獻研究》2015年第2期，2015年6月。
- 李曉萍，〈朝鮮詩人丁若鏞“三吏”與杜甫“三吏”之比較研究〉，《安康學院學報》第23卷第5期，2011年10月。

### (四)學位論文

- 孫玉霞，《丁茶山與杜甫詩歌創作的比較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少數民族語言文學院博士學位論文，2010年)。
- 劉麗，《丁若鏞《詩經》接受研究－以詩經觀和漢詩創作爲中心》(威海：山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年)。